

# 论 21 世纪中国对 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sup>\*</sup>

孙德刚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逐步建成了立体多维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其以与世界大国的伙伴关系为“点”,以与陆海邻国的伙伴关系为“线”,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为“片”,以与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体”。点、线、片、体相互支撑,彼此配合。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关系网”,美、欧、俄在中东的“军事联盟网”和中东国家之间的“教派阵线网”形成多元复合结构。中国在中东的伙伴选择受对象国战略合作能力与意愿的双重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双方经济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根据这五类因素可将中国的中东伙伴国分为支点国家、结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它们分别在海湾、东地中海、红海和马格里布四个次区域支撑着中国在中东的多维伙伴体系。中国的中东伙伴外交与西方联盟外交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表现为“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以发展促和平”与“以实力求和平”、“强化主权”与“强化安全”、“交朋友”与“找敌人”以及“软制衡”与“硬制衡”的差异。

**【关键词】** 伙伴外交;中国与中东;中国外交;战略合作伙伴;联盟外交

**【作者简介】**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9)07-0106-25

---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论 with 案例研究”(项目编号:16JJDGJW011)、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14PJC092)和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项目编号:15SG2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 一 问题的提出

伙伴关系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外交学等不同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涉及手段、目标、期限、参与方式、责任与沟通等诸多方面,是行为主体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理念、机制与行为的总和。<sup>①</sup>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学科背景下,伙伴关系的主体不同,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产业与国家。近年来国际上还出现了不同类型主体间相互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现象,如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的语境下,伙伴关系专指主权国家的对外合作行为,包括经济伙伴、政治伙伴和安全伙伴等。广义的伙伴亦包括军事联盟,如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美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联盟也常常被冠以伙伴关系之名。<sup>②</sup>

21世纪以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关系具有多边和双边两种形态。前者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阿拉伯国家,以下简称阿盟)、非洲联盟(包括10个非洲阿拉伯国家,以下简称非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湾阿拉伯六国,以下简称海合会)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五国)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开展的集体合作,如中国与阿盟在2010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2018年进一步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后者指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双边伙伴外交,包括同阿尔及利亚(2014年)、埃及(2014年)、沙特阿拉伯(2016年)、伊朗(2016年)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2018年)五个中东国家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土耳其(2010年)、以色列(2017年)、卡塔尔(2014年)、约旦(2015年)、伊拉克(2015年)、摩洛哥(2016年)、苏丹(2016年)、吉布提(2017年)、阿曼(2018年)和科威特(2018年)10个国家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理论研究以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理论研究为主,经验研究以区域与国别案例研究为主。从理论研究来看,孙忆和孙宇辰从经济伙伴的概念入手,提出“伙伴国对华贸易依赖度及其与中国的政治立场相似度是影响中国能否与之构建多重制度联系的核心

<sup>①</sup> Easwar Iyer, "Theory of Alliances: Partnership and Partner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Nonprofit & Public Sector Marketing*, Vol.11, No.1, 2003, p.46.

<sup>②</sup> Knox Thames, "Forging a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on Religious Freedom,"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2, No.3, 2014, pp.1-4.

因素”；<sup>①</sup>格奥尔格·斯特吕弗( Georg Strüver) 探讨了中国伙伴外交如何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之间加以平衡；<sup>②</sup>周亦奇等人对比分析了中国的伙伴关系与美国的联盟体系；<sup>③</sup>王峥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视角探讨了伙伴关系；<sup>④</sup>陈志敏从现实理想主义出发,研究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伙伴战略；<sup>⑤</sup>门洪华、刘笑阳、张锐、孙学峰、丁鲁等学者则从战略实施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如何构建、管理和升级伙伴关系。<sup>⑥</sup>

以上研究均推动了理论发展,但仍未充分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第一,在冷战结束后的 10 年中,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新兴大国,无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还是地区中小国家,都曾致力于发展伙伴关系,但为何唯独中国在此后还在继续坚持,甚至在 21 世纪初将其上升为一项外交战略,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其他政府文件中?第二,截至 2019 年 3 月,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地区组织(包括欧盟、非盟、东盟、东盟、太平洋岛国论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和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但为什么只选择同 178 个建交国中的约 90 个建立了伙伴关系,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是地域代表性还是与中国国家利益的相关度?第三,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具有动态性和层次性,分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等诸多层次,中国对伙伴外交实施差序式管理的原因是什么?

从区域与国别的经验研究来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从国际安全视角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探讨中国“结伴不结盟”“以对话促冲突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干涉内政”

<sup>①</sup> 孙忆、孙宇辰《中国经济伙伴网络中的多重制度联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4 期,第 101—128 页。

<sup>②</sup> Georg Strü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0, No.1, 2017, pp.32-37.

<sup>③</sup> 周亦奇《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载《国际展望》,2016 年第 5 期,第 21—39 页; Colleen Chidley,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lig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kon*, Vol.41, No.1, 2014, pp.141-157; V.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sup>④</sup> 王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伙伴关系外交的新演变和新特征(2013—2017)》,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第 4 期,第 167—175 页。

<sup>⑤</sup> 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载《太平洋学报》,1999 年第 3 期,第 12—20 页。

<sup>⑥</sup>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第 65—95 页; 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2 期,第 54—76 页; 张锐《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载《国际展望》,2016 年第 5 期,第 40—59 页; Wiktor Adam Sajdak, “Assess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Policy: Does EU-China Dialogue Architecture Fit the Objectives of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Policy Towards China?” *L’Europe en Formation*, No.370, 2013, pp.123-131.

和“和平共处”等安全合作理念对伙伴关系的影响,分析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加强政策沟通的意义。

第二类主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分析双方贸易、能源和产能合作的现状与前景,探讨“一带一路”、上下游能源项目、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投资(港口、核电站和铁路)、航空航天(卫星导航与探月计划)等领域的合作,探讨“正确义利观”和“以发展促和平”等理念在中东的实践。

第三类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探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和人文交流关系,包括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双方在执政党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区域自治、经济特区建设、“一国两制”、粮食安全、青年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以上经验研究兼具学理导向和政策导向,但对当前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的顶层设计研究不够深入,对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的特殊性梳理不够细致,对中国的中东伙伴外交与西方国家的中东联盟外交的对比研究不够系统。

本文以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中东外交的系列讲话、中阿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执行计划、《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宣言》、中东国家对华政策报告等官方文件为基础,将外交学理论同中东区域与国别案例研究相结合,考察21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伙伴外交的概念、推动因素、类型和特征。

## 二 中国特色伙伴外交的概念阐释

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类型学研究日益兴盛,如斡旋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二轨外交、高铁外交、港口外交等。自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伙伴关系以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成为中国外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伙伴外交应运而生。<sup>①</sup>

本文伙伴外交的概念是指:主权国家为追求共同利益和预防不确定性,在战略合作协定基础上与他国(国际组织)构建整体合作框架,加强战略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促进互利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行为和政策的总和。根据这一定义,伙伴外交具有以

<sup>①</sup> Georg Strüver,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etween Interests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283, 2016, p.7, [https://www.giga-hamburg.de/de/system/files/publications/wp283\\_struever\\_0.pdf](https://www.giga-hamburg.de/de/system/files/publications/wp283_struever_0.pdf),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1日。

下内涵:其一,它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客体是主权国家和由其组成的国际组织,各方深信伙伴关系是一种低投入、低风险的“正资产”。其二,它的载体是战略合作协定,包括围绕建立战略伙伴(合作)关系而形成的政府公报、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等法律约束力较低的非正式协定。其三,它强调顶层设计与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以此促进相互信任、增进共同安全和推进共同利益。其四,它以“结伴不结盟”为原则,坚持开放性的国际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以规避政治风险。其五,它倡导求同存异,促进双方各部门间的功能对接,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低政治领域(经贸、社会、文化)主张深度融合,在高政治领域(国防、安全、主权)强调独立自主。

冷战结束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纷纷超越军事联盟、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形成不针对第三方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为伙伴外交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sup>①</sup>中国的伙伴外交从实践发展到理论,从局部发展到全球,合作机制日趋成熟。2014年,习近平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2019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这一重要政策文件六次提及伙伴,重申中国将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sup>②</sup>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全球伙伴体系已初步形成,它是在不结盟和求同存异原则的指导下,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在全球范围内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层次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特色伙伴外交具有整体性、兼容性、平衡性与实践性四大特征。

第一,整体性。与斡旋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二轨外交等议题导向的局部性外交类型相比,伙伴外交更具整体性。它从中国与对象国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关系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做到了纲举目张。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伙伴外交维护了中国的全球利益,有利于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全球影响力,对应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中国与大国的伙伴关系为“点”,与陆海邻国的伙伴关系为“线”,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为“片”,与多边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体”。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组织共同组成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的有机整体。

第二,兼容性。中国之所以偏好伙伴外交,主要是因为作为冷战产物的联盟外交

<sup>①</sup> 参见 V.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2010。

<sup>②</sup>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北京:外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页。

迄今仍然在西方大国的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兴大国倡导的伙伴外交成为后冷战时期国与国关系的“新常态”,与联盟外交具有兼容性。有学者认为,伙伴外交概念过于宽泛,几乎无所不包,合作目标与实现手段都具有模糊性。他们认为,中国的伙伴外交实际上“只有外交而无伙伴”,只有象征性宣誓而无操作性条款。<sup>①</sup>甚至有人认为,伙伴关系类似于“清谈馆(talk shops)”,仅有华丽的外表,并无实质性内涵。<sup>②</sup>这种对伙伴外交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其兼容性的理解还不够全面。美国在亚太和欧洲的盟友几乎全部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这彰显了伙伴外交的强大兼容性。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兼容性更加明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埃及和以色列等国是美国的盟友,伊朗、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了“三角联盟”,但这并未妨碍上述国家分别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由于伙伴外交与联盟外交之间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中东国家无须在大国之间“选边”。2017年吉布提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又与美国、法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保持“特殊关系”。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所指出,伙伴关系与联盟关系具有本质不同。前者更强调平等性、和平性与包容性,后者更强调主从依附性、敌我对抗性和对外排斥性。

第三,平衡性。中国的伙伴外交与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中庸之道”是经典儒家思想,其在承认事物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追求不损害各方利益的中和与平衡,摒弃锋芒毕露与针锋相对,强调柔性方式,以求同存异作为处理不同诉求的原则。<sup>③</sup>从结构主义角度看,伙伴外交形成了开放、多元和求同存异的对等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的联盟体系形成了鲜明区别。<sup>④</sup>

中国在开展伙伴外交时,会从地区力量的平衡出发,照顾世界主要地区国家的舒适度,避免“厚此薄彼”、拉帮结派。中国通过“等距离”的伙伴外交充分展现了自身“不选边、不站队、不结盟”的平衡外交理念。在新兴大国中,中国与巴西和俄罗斯同期建立伙伴关系;在北美洲地区,中国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几乎同时建立伙伴关系;在东亚地区,中国和日本、韩国几乎同时建立伙伴关系;在南亚,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同期建立伙伴关系;在欧洲,中国与法国、英国相继建立伙伴关系;在中

① Wiktor Adam Sajdak, “Assess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Policy: Does EU-China Dialogue Architecture Fit the Objectives of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Policy Towards China?” p.129.

② D. S. Hamilton, “The American Way of Partnership,” 2014, p.21, [http://www.egmontinstitute.be/project\\_news/the-american-way-of-partnership/](http://www.egmontinstitute.be/project_news/the-american-way-of-partnership/)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1日。

③ 于潇、孙悦《全球共治理论与中国实践》,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79页。

④ 刘博文、方长平《周边伙伴关系网络与中国周边环境》,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3期,第68页。

东地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相继建立伙伴关系,2016年又同时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第四,实践性。中国的伙伴外交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结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步从策略上升为战略。近代以来,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苏联)、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还是其他欧洲大国,联盟外交均是对外安全战略中的基石,伙伴外交只是一种补充。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大国,对伙伴外交的偏好与近代以来中国对联盟的负面认识有关。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直是西方大国联盟政治的牺牲品。中国和苏联虽然在1950年结盟,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两国关系破裂,联盟名存实亡,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联盟的不信任感和对联盟外交的负面看法。中国认为联盟政治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霸权国以牺牲盟友的自主权为代价建立不平等的主从关系;认为联盟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容易诱发战略误判,还是霸权国家侵略弱小国家的工具。<sup>①</sup>受此影响,中国更加偏好独立自主的伙伴外交。

中国伙伴外交的实践探索根植于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国际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整合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市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但已不存在对抗性的结构矛盾。中国主张遵循新安全观增进安全,削弱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联盟的影响,在多极化格局中形成相互重叠的伙伴关系网,增强大国间战略互信,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自主。这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又契合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潮流。<sup>②</sup>

从实践出发,中国伙伴外交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策略到战略、从区域到全球的变化。早在1999年,陈志敏就提出,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向综合实力大国转型的过程中应奉行伙伴战略,即优先追求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先采用伙伴外交手段,重视发展和主要力量中心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追求中国外交目标的最佳实现。<sup>③</sup>金正昆则提出,中国的伙伴战略重对话、讲合作,重视全方位、多层次地与世界各国积极而广泛地发展良性互动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伙伴战略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告自己既不会主动与别国对抗,也不会谋求霸权或者同别国结盟,而是寻求互利合作、利益共生。<sup>④</sup>

<sup>①</sup>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RAND, 2009, p.88.

<sup>②</sup> 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30页。

<sup>③</sup> 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第13页。

<sup>④</sup> 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抉择》,载《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7期,第43页。

冷战后中国的伙伴外交实践丰富了中国特色伙伴外交理论。尽管伙伴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冷战刚结束时,其尚处于摸索阶段。因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文本中均无伙伴、伙伴关系或伙伴外交的表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对外关系部分首次两度提及伙伴概念,即“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sup>①</sup>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全球伙伴关系的概念,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sup>②</sup>中国特色伙伴外交遵循从局部到整体的实践路径,是对中国30年伙伴外交经验的总结。

### 三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推动因素

截至2017年年底,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国家与地区组织共有105个。其中亚洲36个,非洲16个,拉丁美洲17个,欧洲和北美地区28个,大洋洲8个。<sup>③</sup>中东地区是近年来中国伙伴国增加最多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共有包括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南苏丹<sup>④</sup>等国在内的25国,按地域可分为海湾9国、东地中海5国、红海6国、马格里布5国四个次区域。其中,已经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有15国,包括海湾地区7国(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伊拉克、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东地中海地区两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红海地区四国(埃及<sup>⑤</sup>、约旦、苏丹和吉布提)和马格里布地区两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体现出了地域代表性上的平衡。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与1949年后中国同中东国家建立的友好关系一脉相承。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和索马里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四个非洲国家,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包括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60页。

③ 王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伙伴关系外交的新演变和新特征(2013—2017)》,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第170—171页。

④ 在22个阿拉伯国家中,科摩罗因地缘上远离中东,故不在考察之列。南苏丹自独立以来一直属于中国外交部西亚北非司的主管区,故纳入考察范围。

⑤ 埃及地跨红海和东地中海,本文将其归入红海地区。



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等。<sup>①</su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中东国家从“反帝”“反霸”“反殖”的政治伙伴演变为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的新型伙伴。1999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中东、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2016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指出“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伙伴。”<sup>②</sup>

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大国在中东地区塑造了脆弱的多极格局,安全形势始终具有不确定性,使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经常受到域外大国中东战略调整的干扰。其二,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同地区国家的“教缘政治”和以部落为基础的“血缘政治”相互交织,使中国的伙伴外交面临更加复杂的地区环境。其三,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以维护国家主权、建立政治友好关系、拓展商业利益、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为主要诉求,双方国内各部门存在协调统筹、政策对接的难题。

美俄等大国国内均有观点认为,21世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没有变化,冲突、对抗、竞争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丧失功能,现实政治(realpolitik)已重新回到世界舞台。<sup>③</sup> 因此美俄将中东地区国家分成“朋友与敌人”两类,以实力求和平、以军备求绝对安全是其基本逻辑,但最终反而使自身更加不安全。中国强调不冲突、不对抗、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赢者通吃。<sup>④</sup>

21世纪以来,中国同中东15国建立了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体现在伙伴国数量不断增加、伙伴层级的不断提高与合作内涵的不断丰富上。中国在中东开展伙伴外交,会权衡各种因素,其中对象国能力(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治稳定性)和意愿(双方经济依存度、政治友好度)是最主要的考虑。

第一,对象国经济实力。中东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

① 张颖《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5期,第35页。

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4日。

③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4, 2019, pp.7-50; Charles L. Glaser, “A Flawed Framework: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4, 2019, pp.51-87.

④ Georg Strüver,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etween Interests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283, 2016, p.7, [https://www.giga-hamburg.de/de/system/files/publications/wp283\\_struever\\_0.pdf](https://www.giga-hamburg.de/de/system/files/publications/wp283_struever_0.pdf),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1日。

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经济实力既包括国内经济表现,又包括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其中的要素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就业情况、零售商品与食品销售额、新增住房量、制造业与贸易增加值、股票市场状况等。<sup>①</sup> 本文选取GDP作为衡量中东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GDP居中东地区前十位的国家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GDP居中东后十位的国家中,除约旦、苏丹和吉布提外,均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对象国地区影响力。中东国家的地区影响力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地区影响力的核心是军事能力,包括武器装备、指挥、通信、情报、对关键地区的控制能力、战斗人员士气和素质等主客观因素。中东国家国情差异较大,军事实力参差不齐。各国拓展影响力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是军事力量投射,其中的佼佼者如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其二是依靠宗教和教派力量,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分别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地区具有独特地位;其三是独特的战略资源,如海湾国家拥有油气资源,摩洛哥拥有磷酸盐,埃及扼守苏伊士运河,伊朗扼守波斯湾,土耳其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吉布提扼守亚丁湾等。本文选取军费开支作为衡量中东国家地区影响力的指标。按照这一标准,军费开支居中东前十位的国家中除叙利亚外,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军费开支居中东后十位的国家中,除约旦和吉布提外,均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三,对象国政治稳定性。中东国家稳定性越强,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伙伴关系着眼于中长期合作,需要稳定和可预期的政治环境作为保障。如果对象国局势动荡、中央政府丧失权威,就难以开展中长期战略合作,中国的伙伴外交就会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中东国家的政局动荡有内生与外生两方面原因。前者主要是因部落、民族和教派冲突而导致国家认同感下降,甚至陷入内战和事实上的分治,这在索马里、也门、黎巴嫩、苏丹和巴勒斯坦等国表现得较为突出;后者指因外部力量干涉而导致政府丧失权威,从而出现孱弱的中央政府,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本文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公布的国家稳定指数作为衡量中东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标准,其主要基于12个子指标。它们分别是:国家安全架构、派系斗争、群体性事件、经济衰落、经济发展失衡、人才外流、政府合法性、公共服

<sup>①</sup> “The Top 10 Economic Indicators: What to Watch and Wh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Journal, August 2003, <https://www.aaii.com/journal/article/the-top-10-economic-indicators-what-to-watch-and-why>,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1日。

务、人权与法治建设、人口压力、难民与流离失所者比例以及域外力量干涉。<sup>①</sup> 在中东排名前十的稳定国家中,除巴林和突尼斯外,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中东最为动荡的十个国家中,除伊拉克、埃及和苏丹外,其他均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四,双方经济依存度。中东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越高,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意愿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以海合会六国、埃及、约旦、以色列和摩洛哥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安全上依靠西方,在经济上则奉行多元平衡战略;以伊朗、叙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安全上依靠俄罗斯,在经济上也奉行多元平衡战略。中东国家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意愿与双边经济依存度息息相关。近年来,中东国家与区域外的贸易依存度远超过地区内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东亚国家内部的贸易依存度高达 51%,拉美国家内部为 19%,非洲国家内部为 16%,中东国家内部仅为 10%,其中马格里布国家之间低至 4.8%。中东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域外力量,而不是域内国家。<sup>②</sup>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依存主要体现在能源、贸易和投资等领域。

就能源关系而言,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奉行多元化战略,但是中东仍是中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科威特、伊朗、阿联酋等国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合作伙伴。就贸易关系而言,截至 2018 年,中国是伊朗以及 10 个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和美国),也是阿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2017 年,阿联酋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 530 亿美元,共有 4000 多家中国公司在阿联酋开展业务,这带动了双方伙伴关系的升级。<sup>③</sup> 就投资而言,截至 2018 年,中国是中东的第一大投资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的发展战略尤其契合,形成了中国与对象国在投资领域的相互依存。中国在摩洛哥的铜矿与锌矿开发、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石油开发、阿尔及利亚的东西高速和非洲最长隧道建设、埃及首都新城建设、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建设、华为通信网建设、中国—埃及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建设上都进行了大额投资,这些都带动了中国伙伴外交的发展。<sup>④</sup> 本文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双

① “CAST Conflict Assessment Framework Manual: The Fund for Peace,” <http://library.fundforpeace.org/library/cfsir1418-castmanua/2014-english-03a.pdf>, 访问时间:2019 年 6 月 21 日。

② Tom Bayes, “China’s Emerging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ence in North Africa,” <https://atlantic-community.org/chinas-emerging-diplomatic-and-economic-presence-in-north-africa/>, 访问时间:2019 年 6 月 21 日。

③ Jonathan Fulton, “China’s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ising,”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2018.

④ Tom Bayes, “China’s Emerging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ence in North Africa,” <https://atlantic-community.org/chinas-emerging-diplomatic-and-economic-presence-in-north-africa/>, 访问时间:2019 年 6 月 21 日。

边贸易额为指标,考察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贸易额上排名前十的国家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在排名最后十位的国家当中,仅苏丹和吉布提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第五,双方政治友好度。中东国家对华政治友好度越高,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意愿就越强,中国开展伙伴外交就越主动。政治友好度主要表现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相互维护对方核心利益的意愿和高层互访频次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其中主权是重中之重。高层互访主要体现在出访领导人的政治级别与频率上。本文选取中国与中东国家高层领导人互访次数作为政治友好度的考察指标。<sup>①</sup>根据这一指标,除阿曼、伊拉克、约旦和苏丹外,2011年以来中国与其他11个战略伙伴的高层互访均超过4次。而在尚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10个国家中,它们与中国的高层互访总体上都在0—2次之间。

#### 四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差序化管理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学者都对中国的伙伴关系构建存有质疑,认为伙伴关系缺乏实质性内容和可信承诺,更像是空洞的概念或表达双方友好意愿的标签,因此中国在战略伙伴的选择上也具有随意性。<sup>②</sup>但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实践表明,伙伴外交是顶层设计、相互统筹、反复酝酿的结果。它旨在将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结合,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结合,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sup>③</sup>事实上,中国的伙伴国在地域和功能上都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然,伙伴关系的“名”与“实”并非绝对一一对应,但是一般而言,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确实体现出伙伴国之间的亲疏远近。21世纪以来中国通常遵循“无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和“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路径来动态管理在中东的伙伴关系。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sup>④</sup>将中东25国分为综合性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三类,指出中国对在中东的伙伴外交采取了差序化管理的方式,即在综合考虑对象国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贸易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五个因素的基础上,

① 高层领导人指中国与中东各国排名前三的政治领导人,如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沙特阿拉伯国王、王储和副王储,伊拉克总理、总统和议长等。

② 张锐《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第41页。

③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82—86页。

④ 有学者将中国的全球伙伴分为支点国家(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结点国家(拓展中国国际合作资源)和一般国家,参见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75页。

将 15 个战略伙伴国分为四个不同层次: 第一层为与五个综合性大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层为与其他两个综合性大国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 第三层为与三个中等强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四层为与中东五个小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具体来说, 中东国家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能力(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和意愿(贸易依存度、政治友好度), 决定了其在中国中东伙伴关系网中的地位。根据对象国的总体权重, 中国对伙伴关系进行了差序化管理。本文将把中东国家分为支点国家、结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四类。<sup>①</sup>

### (一) 支点国家

支点国家是中东地区的综合性大国, 在中国中东伙伴关系网络中发挥着支点和枢纽作用, 是中国维护全球利益、安全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例如, 俄罗斯就是重要的全球支点国家。中俄双方不仅确立了国家元首年度会晤机制、建立了元首热线电话, 而且在总理和部长级别拥有多个直接联系渠道。<sup>②</sup> 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层级上虽然比不上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但也具有某些相似特征, 双方的战略合作也具有全球意义。中国在中东的五个全面战略伙伴——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联酋构成中国在中东伙伴外交中的支点国家。它们分别是马格里布、红海和海湾地区的支点, 发挥着支柱作用。支点国家有如下三点特征:

第一, 支点国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立体多维地帮助中国拓展政治、安全和经济影响力。它们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战略伙伴, 也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要合作者。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提案国, 在阿盟、非盟、地中海联盟等多个平台中都坚定支持中国。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 连续多年是其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sup>③</sup> 2014 年, 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指出: “面对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 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两国应继续开展协调与磋商,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关键作用。”<sup>④</sup>

<sup>①</sup> 尚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目前依托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战略合作平台, 成为战略伙伴候选国。

<sup>②</sup> Feng Zhongping and Huang Jing,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plomacy: Engaging with a Changing World,” p.9, <http://www.egmontinstitute.be/chinas-strategic-partnership-diplomacy-engaging-with-a-changing-world/>, 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1 日。

<sup>③</sup> Chris Zambelis, “China’s Inroads into North Africa: An Assessment of Sino-Algerian Relations,” *China Brief: A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Vol.10, Issue 1, 2010, p.12.

<sup>④</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tz\\_677316/1206\\_677318/1207\\_677330/t1132335.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tz_677316/1206_677318/1207_677330/t1132335.shtml), 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4 日。

中国直到1990年才和沙特阿拉伯建交,但是双方战略合作进步最快,2006年和2009年胡锦涛两次前往访问。沙特阿拉伯是中国在中东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在海合会、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016年习近平正式访问沙特阿拉伯,两国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背景下,中沙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两国已成为彼此在全球的重要合作伙伴。”<sup>①</sup>

埃及是阿盟和非盟的双重代表,也是阿盟总部所在地,是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中的第一人口大国。2014年中埃联合声明宣布将在联合国改革、“南南合作”、中非关系、中国与阿盟关系、金砖国家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等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加强磋商。<sup>②</sup>

伊朗是中东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大国,在阿富汗、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难民和反恐等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长期观察员国,是中国的重要政治与经济合作伙伴。

第二,中国与支点国家高层互访频繁。2016年和2018年,习近平出访了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和阿联酋,它们均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出访埃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201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2016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孙春兰(2017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2017年)、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2018年)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2018年)等。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则分别于2014年12月、2015年9月、2016年9月、2017年9月、2018年9月和2019年4月六次访华,出席了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sup>③</sup>

此外,阿尔及利亚总理艾哈迈德·乌叶海亚(Ahmed Ouyahia)、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等也多次访华。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希望在西方国家对中东能源依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20/c\_11117828248.htm,访问时间:2019年6月25日。

② 《中埃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4日。

③ 《中国同埃及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342/sbgx\_677346/,访问时间:2019年6月25日。

存度下降、亚洲大国对中东能源依存度上升的情况下减少对美战略依赖,推行“向东看”外交。<sup>①</sup> 根据“2030 愿景”计划,沙特阿拉伯将利用亚洲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推动工业化进程。<sup>②</sup> 2017 年萨勒曼国王访华,2016 年和 2019 年穆罕默德王储两度访华。这些互动旨在与西方国家维持地缘政治伙伴关系的同时,与中国建立地缘经济伙伴关系。

第三,中国与支点国家为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设定的目标,通常会建立各种常设对接机构。如 2016 年中埃签订《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后,两国间相继建立联合国问题磋商机制、非洲问题磋商机制、反恐磋商机制、产能合作机制、经贸联合委员会、中埃防务合作委员会、国防科技工业合作联合委员会、科技联合委员会和文化联合委员会等机制。<sup>③</sup> 中沙于 2016 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成立了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沙方牵头人是穆罕默德王储。截至 2019 年 2 月,双方已举行了三次高级别委员会会议。此外,中国和伊朗也成立了经贸联合委员会。

## (二) 结点国家

结点国家是指中东伙伴国中具有特殊地位,在中国与世界大国(或大国集团)开展合作、维护中国全局利益时能够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从而形成“中国—结点国家—世界大国”关系。中国与结点国家的伙伴外交具有全球影响,但是双边关系尚未达到全球战略层面。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结点国家的代表。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大经济体和二十国集团成员,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纽带,在黑海地区、地中海地区、伊斯兰世界、欧亚大陆和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中都发挥着独特作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奉行新保守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又名“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sup>④</sup>在中东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派兵叙利亚,在卡塔尔、苏丹、索马里等国部署军事力量,同卡塔尔建立“亲穆兄会”联盟,与沙特阿拉伯争夺地区主导权。

2010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土耳其,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也是中国迄今在中东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中土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将“应对各种全

① Makio Yamada, “Saudi Arabia’s Look-East Diplomacy: Ten Years 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22, No.4, 2015, p.121.

② “السمود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مملكة 2030 رؤية”, <https://vision2030.gov.sa/ar>, 访问时间:2019 年 6 月 24 日。

③ 《中国和埃及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年实施纲要》,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htws/document/1466160/1466160.htm>, 访问时间:2019 年 6 月 25 日。

④ Igor Torbakov, “Neo-Ottomanism Versus Neo-Eurasianism? Nationalism and Symbolic Geography in Postimperial Turkey and Russia,”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28, No.2, 2017, p.125.



球性挑战,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懈努力”。<sup>①</sup> 2010年两国设立了军事合作高级对话会(副总参谋长级别)。2011年,两国成立了外交部联合工作组机制,合作内涵不断丰富。

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埃尔多安作为唯一一位中东地区国家元首出席会议。<sup>②</sup>在经济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相互契合,土耳其成为“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框架下中国投资中东基础设施的重点地区。在贸易上,土耳其成为中国出口欧洲商品的重要中转站。在安全上,土耳其是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唯一的北约成员国。中土两国在联合军演、军事互访和军事技术交流等领域建立起密切关系,成为中国与北约发展关系的桥梁。2018年7月,埃尔多安在会见习近平时强调,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愿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和协调。<sup>③</sup>

以色列也是中国在中东的结点国家。2017年中以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色列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独特战略伙伴(类似中国和瑞士的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联合声明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色列在创新、研发领域具有全球公认的领先地位。”<sup>④</sup>中以还建立了若干机制以推动合作关系。2013年,双方建立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2014年5月,双方建立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以色列外交部与中共中央党校还建立起联合培训机制。

中以战略合作有助于推动中国与第三方的合作,成为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的桥梁和纽带。在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双方一致同意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以色列作为创始成员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框架下,加强与第三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创新合作。<sup>⑤</sup>“中以+第三方”的合作模式使以色列成为中国在中东的重要结点国家,也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如美国)和 大国集团(如欧盟)开展全方位合作的窗口。

当然,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尽管具有兼容性,但难免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0年10月9日。

② Ahmet Faruk Isik and Zou Zhiqiang, “China-Turkey Security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Middle Corridor’ Initiatives,”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13, No.2, 2019, p.5.

③ 《习近平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27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447466.shtml>,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5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447466.shtml>,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5日。



2019 年以来,美国对于中资公司参与阿什杜德港和海法港的投资与运营表达了不满,认为此举威胁到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安全。<sup>①</sup>

### (三) 重点国家

重点国家即在中东地区拥有相当体量和经济发展潜力、在周边地区能够发挥辐射作用的地区强国。在中国中东伙伴外交中,苏丹、伊拉克和摩洛哥是重点国家的代表,它们分别在红海、海湾和马格里布地区发挥辐射作用。

首先,上述重点国家是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合作对象。2015 年,中国和苏丹在联合声明中指出,“苏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中国“支持苏丹为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加强国内各地区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sup>②</sup> 2016 年,中国和摩洛哥的联合声明也强调,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sup>③</sup>

其次,重点国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对象。中国与苏丹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中国将苏丹视为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战略伙伴和紧密朋友;加强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合作等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sup>④</sup> 中国和伊拉克一致同意“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识,巩固战略互信”;<sup>⑤</sup> 中国与摩洛哥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对中非合作论坛为加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支持南南合作做出的宝贵贡献深表满意,中方赞赏摩洛哥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中发挥的作用。

最后,重点国家为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发挥了辐射作用。在东非地区,苏丹是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在东非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在海湾地区,无论是从面积还是人口来看,伊拉克都是地区强国,中国则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该国投资能够产生辐射作用;在马格里布地区,摩洛哥是中国的重要伙伴国,其具有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地中海国家和大西洋国家等多重身份,成为中国在马格里布地区推

<sup>①</sup> Amos Harel, “Israel Is Giving China the Keys to Its Largest Port and the U.S. Navy May Abandon Israel,” *The Haaretz*, September 17, 2018.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01/c\\_128188802.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01/c_128188802.htm), 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3 日。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1/c\\_1118849465.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1/c_1118849465.htm), 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3 日。

<sup>④</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01/c\\_128188802.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01/c_128188802.htm), 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5 日。

<sup>⑤</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22/c\\_1117546252.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22/c_1117546252.htm), 访问时间: 2019 年 6 月 25 日。

进“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上述三国是中国在这三大次区域推进互联互通的重点国家。

#### (四) 据点国家

据点国家是指面积小、人口少、经济体量有限,但对华友好度较高、参与经贸合作项目热情较高,能够对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保护发挥据点作用的伙伴国。这类国家包括卡塔尔、阿曼、吉布提、约旦和科威特五国。

首先,据点国家的体量和经济规模有限。如吉布提人口不足100万,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卡塔尔、阿曼、约旦和科威特也都是人口小国,国民均少于500万人。这些小国处于大国的夹缝中,往往成为地区冲突的受害者,同域外大国开展战略合作有助于平衡地区大国。如吉布提处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sup>①</sup>科威特曾遭受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入侵,约旦处于以色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大国的角力之中,阿曼和卡塔尔则处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地缘政治博弈的阴影之下。

其次,据点国家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如吉布提扼守从红海到亚丁湾的海上咽喉,约旦拥有亚喀巴这一关键港口,阿曼、科威特和卡塔尔靠近石油储量占世界近一半的波斯湾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些小国拥有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在大国的政治博弈中保持动态平衡。在吉布提,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同时拥有军事基地。2017年11月,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Ismail Omar Guelleh)指出,吉布提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一个可以帮助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实现稳定的“岛屿”。<sup>②</sup>此外,阿曼和约旦也长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

最后,据点国家对华友好度较高,积极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上述五国在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均宣布“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2014年,中国和卡塔尔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军工军贸合作,增进在技术装备、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军事合作,开展军事院校间的交流”。中方欢迎卡塔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sup>③</sup>2015年,中国和阿曼宣布两国将以杜库姆中国产业园为龙头,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阿曼“九五规划”对接。<sup>④</sup>2015年,中国和约旦在联合声明中指

<sup>①</sup> Sun Degang and Yahia Zoubir, "The Eagle's Nest in the Horn of Africa: US Military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Djibouti," *Africa Spectrum*, Vol.51, No.1, 2016, p.111.

<sup>②</sup> 《习近平同吉布提总统会谈》,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24日。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卡塔尔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4日。

<sup>④</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曼苏丹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26日。

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双方愿共同探讨在此框架下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sup>①</sup>2017年11月,习近平在会见盖莱时指出:“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就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和平与安全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sup>②</sup>2018年,科威特宣布将进一步与中国加强政策沟通,围绕中科共同编制的双边合作规划纲要,推动“一带一路”与科威特“2035国家愿景”对接。<sup>③</sup>

表 1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层次

结伴对象	伙伴层级	结伴时间	伙伴关系类型	所在区域
阿尔及利亚	支点国家	2014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马格里布地区
埃及	支点国家	2014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红海地区
沙特阿拉伯	支点国家	2016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伊朗	支点国家	2016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阿联酋	支点国家	2018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土耳其	结点国家	2010年	战略合作关系	东地中海地区
以色列	结点国家	2017年	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东地中海地区
苏丹	重点国家	2014年	战略伙伴关系	红海地区
伊拉克	重点国家	2015年	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摩洛哥	重点国家	2016年	战略伙伴关系	马格里布地区
卡塔尔	据点国家	2014年	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约旦	据点国家	2015年	战略伙伴关系	红海地区
吉布提	据点国家	2017年	战略伙伴关系	红海地区
科威特	据点国家	2018年	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阿曼	据点国家	2018年	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地区

资料来源: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4日; Georg Strü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pp.62-64。

① 《中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9月10日。

② 《习近平同吉布提总统会谈》,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24日。2019年4月,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来华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③ 《习近平同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会谈》,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10日。

## 五 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理念特征

国家间的合作形式千差万别,联盟外交并非伙伴外交的对立面。两类合作都有外溢效应,但是前者的排他性较强,后者的排他性则较弱。军事联盟协定属于“硬法”,其安全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盟友间达成和履行协议的成本较高;伙伴关系所依赖的战略合作协定(如联合声明)是一种“软法”,双方的承诺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能够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和新任务不断推进合作,具有高度灵活性。<sup>①</sup>在“结伴不结盟”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也具有战略意义。自1949年以来,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由双边到多边、由意识形态主导到务实合作主导的演变过程。<sup>②</sup>中东国家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和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的重要一环,同时中国的伙伴外交与西方的联盟外交也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

第一,中国中东伙伴外交倡导新安全观。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具有多元复合特征,其中包括美、欧、俄在中东的军事联盟网,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在中东的教派阵线网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大国在中东的战略伙伴网。“三网”并存,域内和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建立起了相互重叠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体系。<sup>③</sup>

与联盟外交倡导的传统安全观不同,21世纪亚洲大国在中东建立的战略伙伴网倡导新安全观。中、印、日、韩等在中东构建的战略伙伴网络面临军事联盟网和教派阵线网的双重张力,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印度—巴西—南非合作组织、环印度洋联盟、二十国集团、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组织等都是新安全观的载体。<sup>④</sup>中国特色中东伙伴外交体现出中国在中东日益拓展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冲突解决意愿和逐步提升的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能力。同时,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也为中东的地区冲突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在中东奉行不结盟政策,与冲突各方均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和“结伴不结盟”的思想有助于中东国家缓解安全困境。中国主张在全球化时代和同一国际体系下,中东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减少零和博弈。在新安全观指导下,

<sup>①</sup> Georg Strü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p.30.

<sup>②</sup> 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4页。

<sup>③</sup> Michael Smith and Xie Huaixia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The Logic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Vol.6, Issue 4, 2010, p.434.

<sup>④</sup> Colleen Chidley,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lig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kon*, Vol.41, No.1, 2014, p.155.

中国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避免集团政治与结盟对抗。2018年7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指出“域外力量应该多做劝和促谈的事,为中东和平发展提供正能量。要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输我赢、唯我独尊,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sup>①</sup>从这种意义上说,联盟外交和教派政治的前景是悲观的,中国中东伙伴外交的前景是乐观的。前者受威胁驱动,以制裁、封锁、遏制、威慑、战争作为维护绝对安全的手段;后者主张循序渐进,以合作求安全,追求共同安全。

第二,中国中东伙伴外交主张“以发展促和平”。联盟外交追求“以武力求和平”,大国通过军售、部署军事基地和联合军事技术开发等手段提升盟友军事实力,从而维护盟友安全。盟友之间在国防和外交层面加强对接(如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2+2”磋商机制),但商务、文化等部门参与较少,其合作呈现经济和安全二元分离的特点。中国中东伙伴外交追求“以发展促和平”,通过促进对象国的经济社会进步,维护其国内和平与稳定。伙伴外交着眼于未来,旨在建立利益共同体,以经济促政治,以政治促经济。它倡导经济和安全的二元融合,领导人通过顶层设计,统领双方政治、安全、经贸、文化关系,促进相互投资与贸易,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舞台上协调立场。<sup>②</sup>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促进双方各领域交流,对内统筹、相互对接,通过互利合作消除伙伴国的不稳定因素。

联盟的功能具有单一性,本质是战争共同体,是“以武力求和平”的体现;中国特色伙伴外交的功能则具有综合性,是“以发展促和平”的体现。当前,中国是中东地区的最大投资国、最大能源进口国和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外交符合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伙伴外交将中东地区国家整合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利益共同体形成安全共同体,通过安全共同体形成价值共同体。求同存异、互利共赢是其中的隐性逻辑。2016年,习近平在开罗阿盟总部发表主旨演说时指出“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sup>③</sup>

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大局,而不是与其他大国开展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争夺。中国在中东开展伙伴外交时无意拓展势力范围,也无意排挤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力,更无意重构中东秩序。正如赵穗生所言,中国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良好关系,旨在为其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

① 《习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

②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pp.82-86.

③ 《明确中东外交的正位与大道》,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27日。

际环境。<sup>①</sup>

第三,中国中东伙伴外交有助于强化主权原则。联盟外交强化安全,伙伴外交强化主权。在军事联盟体系中,盟友之间往往会形成引领与追随、中心与边缘的主从关系。联盟条款指向共同面临的威胁,属于安全驱动,以制衡敌人为首要任务,中小盟友仅拥有有限主权。不仅如此,在美国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组织之间,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之间均开展了联盟外交,其中结盟的一方均是非国家行为体,这进一步削弱了对象国主权。

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的分裂主义加剧,加上外部势力的干涉,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问题,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问题,伊朗的俾路支问题,索马里兰的独立问题,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南苏丹的冲突问题等,严重影响了中东国家的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中国中东伙伴外交不涉及核心主权让渡,而是强调独立自主;伙伴国不分实力强弱,一律平等。伙伴关系规定了全方位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保留了巨大的灵活合作空间,而不设定具体规范。它指向未来,属于目标驱动,通过战略合作进一步强化伙伴国主权。

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伙伴外交的对象是主权国家以及主权国家组织(如阿盟、非盟、海合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避免与非国家行为体建立战略关系,彰显主权原则。如2015年,中国和伊拉克在联合声明中就指出“双方承诺继续在涉及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安全问题上给予对方坚定支持,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sup>②</sup>

第四,中国中东伙伴外交寻求“交朋友”。联盟外交遵循“找敌人”的思维,伙伴外交遵循“交朋友”的思维。<sup>③</sup>中国发展伙伴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政治制度为标准,其遵循的原则是双方互利共赢。<sup>④</sup>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是统一战线理念在中东外交中的实践。在冷战后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张国际社会成员通过联合自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尽管它们在个体诉求和利益排序上千差万别)。在“扩大朋友圈”理念指导下,中国强调集体安全和共同治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倡导开放性,不排斥对象国与其

① Zhao Suisheng,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for U.S.-China Relation,” in Zhao Suisheng, ed., *China-U.S. Relations Transformed: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8-9; 陶季邑:《美国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15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326983.shtml,访问时间:2019年6月25日。

③ 苏长和《中国外交理论引领世界潮流》,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0日。

④ 李景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发展》,载《新视野》2019年第2期,第9页。

他域外大国及地区大国建立联盟关系。<sup>①</sup> 这些与联盟“找敌人”的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第五,中国中东伙伴外交奉行“软制衡”。迄今为止,集团对抗的“硬制衡”是中东地区的主流理念。就军事联盟网而言,美国组建的中东战略联盟(由海合会六国、埃及和约旦组成的设想中的“阿拉伯版北约”),美以联盟,北约框架下的西方大国与土耳其的联盟、美欧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联盟,俄罗斯与伊朗、叙利亚、土耳其构建的战略联盟或者“准联盟”都是大国在中东“硬制衡”的体现。<sup>②</sup> 就教派阵线网而言,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各自以教派为基础组成了不同的安全共同体,如伊朗、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形成了事实上的反美、反以“抵抗联盟”;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约旦、埃及等国则形成伊斯兰反恐联盟(实际上剑指伊朗);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形成了针对什叶派集团的“心照不宣联盟”;在逊尼派阵营内部,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组成了“反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以土耳其、卡塔尔和苏丹为代表的国家形成了“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上述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教派纷争,实际上也是地区领导权之争,而“硬制衡”贯穿其中。

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客观上“稀释”了大国联盟体系的影响力,有助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形成了一种“软制衡”。在中东地区,美、欧、俄的盟友几乎全部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中国与这些地区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有助于其避免在战略上和其他大国形成不对称的依附关系。美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强迫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苏丹、约旦、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等国家加快“民主化”步伐,而与中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则缓解了这些国家承受的政治压力。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和吉布提等中小国家在地区大国的夹缝中寻求生存,而与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无疑增强了这些国家政府的能力建设和政权安全,提高了安全自主性。

## 六 结论

中国开展伙伴外交源自对联盟外交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认识。在中东地区,无论是军事联盟网还是教派阵线网,本质都是集团对抗,主张泾渭分明的敌友对峙。作

<sup>①</sup> Colleen Chidley,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lig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55; 万青松、王树春:《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博弈与中俄关系的发展逻辑》,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第44页。

<sup>②</sup> 孙德刚、张帅《功能性联盟“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联盟政治的新态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2期,第3—7页。



为社会主义新兴大国和不结盟国家,中国超越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在“结伴不结盟”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这符合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各方利益。

21世纪,中国伙伴外交的内涵已悄然发生变化,中国开展伙伴外交的对象已从大国和周边国家转向中东、非洲和拉美中小国家,从双边合作拓展至多边合作,从对主权国家的伙伴外交转向对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伙伴外交,从实体伙伴转向议题伙伴。例如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其与大国建立的协调、合作与共生关系,就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sup>①</sup>此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精神和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传统伙伴关系的内涵。<sup>②</sup>中国特色伙伴外交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在中东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外交是21世纪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的重要内容。就双边伙伴外交而言,中东国家的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决定了其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经济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则决定了其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意愿,其中经济依存度更是中国开展伙伴外交的关键因素。按照中东15个伙伴国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的能力与意愿,可将其分为支点国家、节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四类,它们在地域上和功能上不同程度地对维护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发挥着立体多维的支撑作用。中国伙伴外交与西方联盟外交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前者倡导新安全观,后者倡导传统安全观;前者强调“以发展促和平”,后者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前者有助于伙伴国强化主权,后者则偏重于强化安全;前者旨在“交朋友”,后者旨在“找敌人”;前者是“软制衡”,后者是“硬制衡”。

展望未来,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也面临诸多挑战: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可使中东国家从与中国的伙伴外交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系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阶段,一旦遇到高政治领域中的冲突,中国的伙伴外交就会受到严重阻碍。<sup>③</sup>处于安全困境中的众多中东国家希望中国的安全上能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重点仍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以避免卷入地区纷争。伙伴国的安全公共产品诉求与中国的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还不能完全匹配。

① Tim Murithi, “The African Union’s Partnerships: Symbiotic Coordination as a Policy Instrument,” in Theo Neethling and Heidi Hudson, eds.,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33; 周玉渊《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44页。

② 朱璇、贾宇《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55页。

③ 周亦奇《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第21页。



第二,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难免会受到域外大国因素的影响。中国在中东开展伙伴外交中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是域外大国。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东的联盟外交与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虽具有兼容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摩擦,前者甚至会对中国在中东开展伙伴外交形成掣肘。在伊朗、苏丹、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就出现过类似局面。伊朗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政治和经贸伙伴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石油购买方和投资方,截至 2018 年年初,中国通过进出口银行累计向伊朗提供贷款高达 850 亿美元。<sup>①</sup> 2018 年 5 月,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追加制裁。2019 年 4 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称将把伊朗石油出口量“减少到零”。这些都对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成了挑战。此外,中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埃及、以色列、阿曼和吉布提等伙伴国商业港口建设的做法也引起美方的猜疑并受到指责。

第三,中国在参与中东地区安全事务中如何发挥战略伙伴国的优势,仍需进一步探索。中国在中东的 15 个战略伙伴国大多具有可观的经济体量和地区影响力,政局相对稳定,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也较高。但时至今日,中东地区仍有 10 个国家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包括也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索马里、利比亚等处于冲突状态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日益边缘化,且国内安全问题有常态化和外溢趋势,成为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如何与中东伙伴国中的支点、结点、重点和据点国家在中东冲突地区加强合作,形成“战略伙伴+”的合作模式,对于中东和平与发展将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

第四,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外交还须在建章立制方面提高创造力。中国已经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了很多物质性公共产品,但是在非物质性特别是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却遭到了很多质疑。<sup>②</sup> 迄今为止,中国在中东地区大国之间趋利避害,开展多轨伙伴外交,这有助于“以发展促和平”,弥合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逊尼派与什叶派、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与反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亲西方阵营与“抵抗联盟”之间的分歧。但是,如何在伙伴外交过程中提出中东安全治理的新理念、新主张、新途径,如何通过实施伙伴外交来做到既维护中国的商业利益,又能够在中东冲突解决中贡献中国的思想性公共产品,帮助中东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仍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

(截稿:2019 年 3 月 编辑:肖 河)

<sup>①</sup> Owen Daniels, “How China Is Trying to Dominate the Middle Ea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china-trying-dominate-middle-east-29922>, 访问时间:2019 年 6 月 21 日。

<sup>②</sup> 张春《中国参与 2030 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载《国际展望》,2015 年第 5 期,第 112 页。

information , and the control of the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It makes ASEAN occupy the centrality 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interactive levels. The current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can be considered as a relational network with ASEAN as its core. In this network , all kinds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interactions in specific areas , such as politics , security and economy , constru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ASEAN and other actors. It makes ASEA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agenda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norms , while guid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 of the super powers. By constructing and consolidating its centrality , ASEAN is able to link the actors i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closely and promote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while ensuring and realizing its own interest demands.

**【Key Words】**ASEAN , ASEAN Centrality , relational network , centrality

**【Author】**Dong He , Assistant Professor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Jinan University.

### **On China ' s Partnership Diploma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Sun Degang** ( 106)

**【Abstract】**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China has gradually formulated a global and multi-dimensional partnership network with the great powers being the “hub” ,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being the “line” ,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being the “mass” ,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ing the “arena”. The layered partnerships are interlinked and mutually enhancing each other. China ' s partnership diploma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its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 and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e Gulf ,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Sea , the Red Sea and the Maghreb region. China ' s “partnership network” , the U.S. , European and Russian-led

“alliance network” as well as the “religious and sectarian network” initiated by the regional powers have forged a complex conglomeration.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s determined by the target countries’ capability and willingness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 including the five factors of their general economic strength , their regional influence , their political stability , thei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 and their congenial political ties with China. Based on these variables , the partner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pivotal states” , the “node states” , the “key states” and the “stronghold states” , which constitute the portfolio of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 the area.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alliance diplomacy in five dimensions “a new security outlook” vs. “an old one”; “a peace-through-development idea” vs. “a peace-through-strength idea”; “sovereignty consolidation” vs. “security consolidation”; “seeking friends” vs. “seeking foes”; and “soft balancing” vs. “hard balancing”.

**【Key Words】**partnership diplomacy ,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 Chinese diplomacy , strategic partnership , alliance diplomacy

**【Author】**Sun Degang , Researcher Fellow ,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Partnership Choice of 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plomatic Strategies**

**Chen Zhaoyuan** ( 131)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areas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 , and choosing FTA partn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Meanwhile , the partnership choice for China’s FTA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economic motivations , domestic politics or international system. Based on a diplomatic perspective , the paper theorizes